

母亲节、母语、母土选举

郑惠芳

联合早报，2011年5月8日

记得去年的今天——母亲节，特地穿了红配白爱国服饰到芳林公园为母语教育请愿。出发前曾担心场面冷清，不敢肯定人们会不会站出来表态，结果看到的情景让人欣慰，数千人有秩序、平静地、充满自信地通过签名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不久后，教育部长说他的意思被误解了，并为他可能具误导性的言辞道歉。许多人觉得这是人民行动党官员破天荒首次为自己所管理的职务道歉，或许是因为意识到人民集合以表达意愿的群众力量与决心。

今年年初，网上开始出现要到芳林公园纪念请愿一周年的想法，只是，大选的消息出炉得更快，投票日恰巧在母亲节前夕。昨夜好梦吗？今天大家一觉醒来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心情。这篇专栏截稿前，大选正烧得炙热，我住的后港选区不知道会呈现哪种版本的风雨同舟，隔条马路阿裕尼集选区居民现在不晓得是手握铁锤或接受闪电洗礼。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见证了历史。

而历史的推进，人们往往别无选择就卷入其中，只有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以便在历史长河里有所交代。

两个母亲节，两种请愿。一次是为母语的良好存活，一次是寄望在母土上有更好的生活与未来。前者是没有实权的签名请愿，后者是用了履行公民义务的选票，两次都借助并展现了群众的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

范式转移的概念最初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孔恩（Thomas Kuhn）提出，最先运用在科学范畴，后也引申到社会科学及市场学，目前在企业界是种很夯的求变模式。它指的是当现有的、人们熟悉并普遍接受的典范里出现反常或不一致，而又无法用现有典范解决这个问题时，就得对现实的观点提出审视，进而改变我们的思考和评价世界的方式，甚至颠覆传统、规则和标准，这种改变就是范式转移。随社会磨合诞生来取代旧有典范去解决问题的新典范，应该被视为较旧有典范进步慎密的，而不只是另一个有别于旧典范的方法而已。另外，它不是被动的、模仿出来的子范，而是主动的、有机的母范，奠定新的基础。

就母语教育而言，这个母亲一路跌跌撞撞，即使已经跌得鼻青脸肿，维护母亲的天职泯灭不了。然而，消肿剂止痛针是不是对症下药，还是只是减轻症状？新加坡最初推行双语政策，渐进变成英语先母语后（English-preferred bilingualism）的政策目标对推广母语完全具钳制作用。大选期间各大小政党无不使用各族官方母语外加文化母语或方言来拉拢民心，“网中人”也质疑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关键绩效指标（KPI）来追求的意义，同样的，以功能性与功利主义主导的语言政策明显存在诟病。要把母语渗透生活，各个社会与文化语言价值必须重新审视，母语的内容更应该认真思考：母语对你来说是什么？母亲的语言？父亲的语言？母族文化里的语言？官方规定的语言？还是骂人时冲口而出的语言？要国人都学母语的用意何在？加强沟通？维护并传承母族文化？建立文化身份认同？还是拓展并把握中国商机？语言政策上的典范转移需要跳出认为单语较多语利于沟通的框框、只有能人才能掌握多语的观念、以及要抬高一种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ety）就必须贬低其他语言变体的既定想法。

至于这次的大选，因为有社交媒体的全情参与，特别凸显青中年选民的投入。有选民自称这时才恍然大悟了解组屋定价架构、明白原来政策制定过程可以如此质疑讨论，甚至“胆敢”向一般视为高高在上的政要追讨领取高薪却办事不力的责任。有言论因此认为这次国人民智终于开启，母土孕育的人民在国事辩论上终于能呈现不惑之年所应有的明辨不疑的能力，即使是弱冠、而立的年轻人也能够成熟无畏地思考国家大事，侃侃而谈。这里呈现的范式转移颠覆了官为君民为臣的单向思维，公然质疑了“都说这是为你好 (It's for your own good)”的政策制定与推行模式，更提出白为“纯净”或白为“空白”的不同意象解读。

大选开战前，教育部承诺下来五年拨款 1200 万元，资助母语教育活动或计划。提名日前夕，总理承诺成立新的工作小组来拉近政府与华社组织并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才。这些计划只是在延续以往的努力，还是能在多大的程度上突破旧有思维模式，推进范式转移，让人拭目以待。今天大选结果揭晓，国人在大选期间展现的那一双双渐硬的翅膀，接下来会以怎样的形式如何的姿态连同新组成的国会成员撑起我国的民主进程，令人期许与关注。

（作者是语言人类学者、政策研究院研究员）